

# 東亞觀念史集刊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EAST ASIA

第 十 四 期

東亞觀念史集刊編輯委員會

中華民國107年6月

JUNE, 2018

# 東西觀念史集刊

## 榮獲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國際合作編著出版」獎助（2012-201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臺灣人文學核心期刊（THCI）」（2016、2018）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期刊數位傳播」（2018.8.1-2019.7.31）

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十四期  
2018年6月

## 東亞觀念史集刊 目次

編輯部	編輯報告	I
<b>特稿</b>		
王汎森	反主義的思想言論——後五四政治思維的分裂	3
<b>專題論文</b>		
路丹妮、鄭文惠	「語言的權力、權力的語言」專題引言	35
邱偉雲	觀念、語言、權力：中國近代平等概念譬喻的政治 再現	45
吳啟訥	1950年代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改革方案興廢背後的 語言政治史	85
李 蕾	西方之外有「哲學」嗎？——「中國哲學之合法性」 辯論與學科知識的全球拓展	117
路丹妮	從觀念的軌跡探究知識分子角色於國家領域內外之 游移：以臺灣外省籍知識分子為例	151
黃美娥	臺灣「反共文學」創作範式的形構、邊界想像與 作家經驗	199
<b>一般論文</b>		
許從聖	〈大學〉「絜矩之道」重探：以荀子、戴震的情理 論述為中心	265
陳曉傑	朱熹與荻生徂徠之思想比較——以「天心」為線索	311
李思逸	民族國家的想像與測繪：孫中山的「鐵路夢」	359

特

稿

特稿

Special Articles

Special Articles





## 反主義的思想言論——

### 後五四政治思維的分裂

王 汎 森\*

#### 摘 要

本文揭示1920年代以降，後五四政治思維的分裂，無論是對「主義」的贊成與反對，隱然涉及了兩種真理觀、救國觀以及社會秩序觀的對立。有些論者認為「主義」代表一種真理，可以拿來救國以及解決社會所有一切問題。相對的，「反主義」論者雖然意見較為個別零星，也並非像「主義」倡議者有著堅定的政治信仰及組織動員力量，然而「反主義」論者承接五四以降懷疑的精神，批判「辯證唯物主義」以及「三民主義」等，反對將抽象的「主義」視為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歸納起來，主義的批判者往往具有下列一種或幾種元素：一、實驗主義，如胡適等；二、實證主義（positivism），如傅斯年等；三、受到英美自由主義或憲政思想影響的人，他們未必對西方自由主義理論本身作過深入的研究，或只是在西方或是日本生活過，如朱光潛、林語堂、張東蓀、吳景超等；四、受中國傳統影響，不能同意「主義式政治」的運作，如梁漱溟、章士釗等。

一些受五四思想文化影響，對「主義」持保留或反對態度者，他

---

\*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

們認為在倡導主義之前，有比主義更為優先或需關注的對象，包括主義談論者的身分資格認定；主張道德、教育、文學優先論；強調「問題」優先於主義，以及認為良心、懷疑、覺悟都優先於主義等等。可以說，「反主義」論者認為個人的自覺不應該被納入到集體政治生活當中，如此才能避免主義式的教條思維及屈從黨意的政治信仰，決定了人的生活方式。此外，民國以來對於主義政治的歌頌，所形成「政治空洞化」的結果，也尤其值得深入思考與反省。

關鍵詞：主義、反主義、三民主義共和國、非政治的生活、  
政治空洞化

## **Anti-Doctrinism Discourse:**

The Split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s in Post-May

Fourth China

Fan-sen Wang<sup>\*</sup>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plit”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s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ince 1920. The advocates and opponents of *Zhuyi* 主義 (doctrinism) implied different worldviews and two opposite stands on how to save the nation and restore the social order. While some scholars considered doctrine as a manifestation of truth and the resolution to all national and social crises, the anti-doctrinists, unlike their rivals who held onto political beliefs and had more effective mobilization ability, tended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individually and sporadically. They inherited the skepticism of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criticized bot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s they disapproved of taking “doctrine” as the panacea for all problems. Moreover, the critics of doctrinism usually belonged to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

---

<sup>\*</sup> Academician and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experimentalist, such as Hu Shi; 2. positivist, such as Fu Sinian; 3. people who were influenced by Anglo-Saxon Liberalism or constitutional thought such as Chu Kuang-Chien, Lin Yutang, Zhang Dongsun, Wu Chingchao, etc. Although they did not necessary have a thorough study on the theory of liberalism, they usually have years of experience living in Western or Japanese societies; 4. people who opposed to politics dominated by doctrines, such as Liang Shuming and Zhang Shizhao.

Those influenced by the thoughts of May Fourth demonstrated a more conservative or even opposing attitude toward doctrinism as they argued that, before following and promoting any doctrines, there were other issues of higher priority, for instance, the identity of the advocates of doctrines. In addition, morality,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individual's conscience, doubts and awareness were also regarded as more essential than doctrines. In other words, the anti-doctrinists believed that personal awareness should not be assimilated into collective political life in order to avoid the danger of personal life being dominated and governed by the principles, doctrines and beliefs of political party.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political hollowing out" was a result of the acclamation to doctrinized politics 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Republican China and is worth further consideration.

Keywords: *zhuyi*/doctrinism, anti-doctrinism, Republic of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non-political life, political hollowing out

## 反主義的思想言論——

### 後五四政治思維的分裂

王 汎 森

本文是〈主義時代來臨〉一文的續篇，主要是在討論各種「主義」風風火火之時，其實也有一些公開或隱然持反對態度的人，但無論何者，都呈現零碎而不成體系的現象。不管是消極地回應「主義」這個「包醫百病」的新政治理論，或是零碎而不成體系地批評，其現象本身也都反襯出「主義化」時期在思想上巨大的力量。本文便是對這個現象的一些初步討論。

胡適（1891-1962）曾說：1923年以後的中國進入了「集團主義（Collectivism）時代」，<sup>1</sup>我則認為1920年代中期以後的中國可以稱為「主義的時代」。不管是「集團主義的時代」或「主義的時代」，都有幾個大致的特徵：一、在思想意見上求同；二、在組織上求團結；三、在工作上求效率。「求同」、「求團結」、「求效率」這三個主軸在當時擄獲了許多青年人的心。但一個國家是否真的應舉國一元化，以「求同」、「求團結」、「求效率」為唯一的一條路，在政治世界中是否有獨一的、不變的真理？是否應遵循獨一、不變的真理？在政治社會上是否有「根本解決」？是否應尋求「根本解決」？當時的「主義」

---

<sup>1</sup>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編》冊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57。

者與「反主義」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更深一層考慮，對「主義」的贊成與反對隱然涉及了兩種真理觀、救國觀以及社會秩序觀的對立。「主義」者認為有一種無限的真理觀，一旦獲得了，它便可以窮盡所有現在及未來可能出現的事理。「反主義」者則主張有限的真理觀，認為事物的個別現象才是真實的，不可能有一種抽象的真理可以照應或解決所有現象、所有問題。在這樣的差異下，延伸出一系列的問題：社會秩序是從社會內部自發生成的，或是可以從外部加上去的？是有系統、有計畫、可以人為構作、並加以調動支配的，還是自然而然運作著的？到底社會是可以一夕之間全盤改變，還是只能一點一滴改良進化？政治上是否有「一抓就靈」的萬靈丹或「聖藥」（李求實〔1903-1931〕語），<sup>2</sup>或是只能有因時制宜的有限處方？是應該統一所有思想、意志、力量在一個領袖下運作，還是應該是多元的政治？這些問題都是當時「主義」與「反主義」兩個陣營的爭論重點。

我們可以說五四之後不久，「主義」即已開始風行，在「主義時代」甚至連政治以外的事物，也往往以是否有「主義」為高——古文字學家胡樸安（1878-1947）稱自己為「樸安主義」即是一例。<sup>3</sup>從1920年代中期以後，左、右兩種「主義」一直主導著政局，吸引了無數的信從者。由「五四」到「主義時代」的這個轉變，其實是「思想的」或「信仰的」區別。五四時代的特色是「思想的」、「學理的」，但在主義的時代，「信仰」是第一，「思想」或「學理」附隨在信仰之下，受信仰的指導。在「真相」、「真實」之前還有一個所謂的「真理」，而這個「真理」是一種信仰，「真相」或「真實」是在這個「真理」的統攝之下才顯得有意義。此處的新「真理」，即是「主

<sup>2</sup> 求實（李偉森）：〈評胡適之的「新花樣」（續）〉，《中國青年》第99期，1925年9月，頁732。

<sup>3</sup> 胡樸安：〈病廢閉門記〉，收於氏著，雪克編校：《胡樸安學術論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9。

義」。不過當「主義」風行草偃之際，始終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對不管是「左」或是「右」的「主義」進行反思或批判。

### 一、

在這裡我無法充分羅列所有「反主義」的思想家，不過我盡可能地把散在各處的言論作一個整理並綜合觀察、討論。主義的批判者往往具有如下一種或幾種元素：一、實驗主義，如胡適等；二、實證主義（positivism），如傅斯年（1896-1950）等；三、受到英美自由主義或憲政思想影響的人，他們未必對西方自由主義理論本身作過深入的研究，或只是在西方或是日本生活過，如朱光潛（1897-1986）、林語堂（1895-1976）、張東蓀（1886-1973）、吳景超（1901-1968）等；四、受中國傳統影響，不能同意「主義式政治」的運作，如梁漱溟（1893-1988）、章士釗（1881-1973）等。

「反主義」思想家的批判對象也有前後的變化，在1920年代之後一段時間，他們批評的主要對象是「辯證唯物主義」。北伐之後，批判對象主要是「三民主義」或是「黨義」，當然左右開弓、對左右兩種主義皆予以批判的也所在多有。<sup>4</sup> 主義的崛起與「新輿論界」的出現有關，與五四前後的輿論界不同。「新輿論界」提供一個思想動員的有力平台，這個平台的主產品便是各種主義。胡適是當時「反主義」思想陣營的代表性人物，但他對於「主義」的態度也有過一些猶疑不定的時候。

早年的胡適對新蘇俄曾有過一段嚮往，1917年3月21日，在美讀書的胡適，有〈沁園春·俄京革命〉上半闕；4月17日，日記上紀錄當晚續成〈沁園春·新俄萬歲〉的下半闕。<sup>5</sup> 從這一闕詞的內容

<sup>4</sup> 見下文對胡適〈我的歧路〉的引用和討論。

<sup>5</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1（臺北：聯經，1984年），頁277。之後該詞有收入《嘗試集》中，全文為：「客子何思？凍雪層冰，

上看，胡適興奮的是對帝制的推翻，人民得到自由，對社會主義的著墨有限。不過這種表述，此後便不再出現。在1919年7月開始的「問題與主義論戰」中，胡適堅持以實驗主義的精神以「問題」對抗「主義」。他堅持實驗主義本來就以一切皆實驗為原則，沒有永恆的、確定不變的真理，既然連永恆的、確定不變的真理都不存在，當然也不認為會有那種籠罩一切的「主義」。<sup>6</sup>

但到了1920年代，原本不大談政治的胡適屢屢對政治發聲。1922年6月16日，胡適在〈我的歧路〉中說：「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然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當時的胡適在文章中重申，實驗主義雖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一種研究問題的方法。這個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只是參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證的材料，絕不是天經地義的信條」，<sup>7</sup>而且他對讀到任何「根本解決」的字眼，都異常敏感，連過去的著作中，使用這個詞而不自知時都提出來加以檢討，以示改過：1923年12月，胡適在〈哲學與人生〉演講中說：「我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所下的哲學的定義說：『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去找根本的解決。』但是根本兩字意義欠明，現在略加修改，重新下了一個定義說：『哲學是研

---

北國名都。想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眾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於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冰天十萬囚徒，一萬里飛來大赦書。本為『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見胡適：《嘗試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23。從內容上看，胡氏對俄國革命的嚮往偏重於人民從帝制中重獲自由的解放，對革命本身社會主義的一面著墨有限。另外，周策縱也曾指出該詩對毛澤東的影響，見周策縱：〈附錄：論胡適的詩——論詩小札之一〉，收於唐德剛：《胡適雜憶》（臺北：遠流，2011年），頁328-329。

<sup>6</sup> 胡適：《問題與主義》（臺北：遠流，1986年）。

<sup>7</sup> 胡適：〈我的歧路〉，收於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冊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65。

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意義上著想，去找一個比較可普遍適用的意義。」<sup>8</sup> 1925年8月，胡適在〈愛國運動與求學〉中說：「救國的事業須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sup>9</sup> 而不是跟隨一種信仰之人。

然而胡適在北伐前後，對「主義」及「社會革命」似有了不大一樣的看法，兩件事情引起這個曲折，第一是到俄國，第二是北伐成功。

胡適於1926年，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深深被所見所聞吸引，使他對7年前在「問題與主義」論戰時的看法有所修正，他在日記中大嘆中國的政客「沒有理想主義」。<sup>10</sup> 民國時期許多學者、文人都曾訪問過俄國，如果能將這些紀錄加以整理爬梳，各人的不同反應會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譬如徐志摩（1897-1931）原是相當崇拜俄國及共產主義的，可是訪問俄京莫斯科之後所寫的文章就開始對共產主義和俄國革命感到遲疑，他一方面讚頌其新銳與壯盛，一方面又批判其殘酷與血流成河。<sup>11</sup> 在徐志摩主編的《新月》中，便常有反對新主義的言論。然而，持「實驗主義」觀點的胡適則說：「我的感想與志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偉大的政治新試驗。」<sup>12</sup> 他又說：「去年遲疑不肯加入『反赤化』的討論，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sup>13</sup> 但是胡適語調中又有些保留，他說馮玉祥（1882-1948）在俄國常給列寧（Vladimir Ilyich Ulyanov, 1870-1924）畫像：「我對他的秘書劉伯堅（1895-1935）諸君說：我很盼望馮先生從俄國向西去看看。

<sup>8</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2，頁556。

<sup>9</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2，頁612。

<sup>10</sup> 胡適：〈致張慰慈〉，收於胡適著，季羨林編：《胡適全集》冊24（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卷23，頁493-494。

<sup>11</sup> 徐志摩：〈歐游漫錄〉，收於徐志摩著，蔣復璁、梁實秋編：《徐志摩全集》（新北：傳記文學，1969年），頁509-598。

<sup>12</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2，頁645。

<sup>13</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2，頁646。

即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sup>14</sup>

因為訪俄能有這麼大的轉移思想作用，所以當時人時常爭論是不是應該要某人假道俄國回來，或是避免從俄國回來，怕從俄國回來後便會被一種「主義」綁架。李大釗（1889-1927）在被捕前一、二月，曾對北京的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sup>15</sup> 胡適後來還是從美國回來了，美國的顏色又深深地蓋在俄國的顏色上面，所以他歸途經過日本時，見到日本老牌共產主義主福田德三（1874-1930）時，鄭重地記下福田一生不敢去美國，免得推翻了他一生信持的學說。<sup>16</sup>

當胡適 1926 年 11 月從海外歸來時，北伐正在進行中，胡適認為這是近代中國的一大轉機。沈剛伯（1896-1977）見胡適，胡適說：「因為要使中國近代化，就非除掉割據的軍閥，讓國民黨完成統一的工作，來實行三民主義的政治不可」、「他本來反對武力革命同一黨專政，但是革命既暴發，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減少戰事，從事建設。」<sup>17</sup> 1927 年，胡適在武漢大學演講時，說社會主義是未來的潮流，而且表示應該讓國民黨實行三民主義，相比於 1917 年時的態度，胡適似乎已經有了明顯的轉變。

總結胡適對「主義」前後不一的態度，我認為和胡適「實驗主義」的主張有關，故他的看法每每要在此標準下才能理解。當他看到俄國大革命建立了一個有理想、有成績的新政府時，在實驗主義的標準下是正面而值得歌頌的。在「主義與問題」的爭論時，他堅持實驗主義，認為天下沒有永久不變的真理，一切都是「待證」的，其實在某個意義上，與他歌頌俄國革命的成果並不全然矛盾，乃至於在 1927 年時，他主張應讓國民黨實行三民主義，也是同一道理。雖然胡適自

<sup>14</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 2，頁 646。

<sup>15</sup> 胡適：〈漫遊的感想〉，《胡適文集》冊 4，頁 29-40。

<sup>16</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 2，頁 678。

<sup>17</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 2，頁 664。

認為說得通，但在外人看來他多少還是擺盪在兩個極端之間。整體而言，凡胡適比較同情「主義」的言論，大多是比較私人的談話、或出現在演講中。但他對「主義」的公然質疑仍然留給人們最為深刻的印象，譬如1924年8月1日，孫中山（1866-1925）在《廣州國民日報》上的批示即可看出，當天該報「影響錄」欄目刊登了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案：此文原來發表於1919年）。孫中山在一旁怒批說：

編輯與記者之無常識一至於此，殊屬可嘆！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權主義」，而上面乃有此「影響錄」，其意何居？且引胡適之之言，豈不知胡即為辯護陳炯明之人耶？胡謂陳之變亂為革命。着中央執行委員會將此記者革出，以為改良本報一事。文批。<sup>18</sup>

《廣州國民日報》上刊出胡適多年前反主義的文章，可見這篇文章受當時人重視的程度。孫中山之憤怒，除了因為胡適對陳炯明（1878-1933）之態度為孫中山所不喜之外，也可以看出孫中山清楚地認為胡適的文章，對他所宣傳的主義是有批判性的。

1928年《民鐸雜誌》出現了兩篇痛批實驗主義者的文章。作者朱言鈞（1902-1961）出身少年中國學會，後來成為數學家。他從哲學的角度出發，在〈駁實驗主義〉一文中說，他要駁的便是「實驗主義者主張天下沒有永久不變的真理」。作者用了很多的邏輯論證，得出「如果凡能發生實驗效果的才是真理，那末實驗主義本身果為真理與否，還是很可懷疑的事」、「主張實驗主義的人到處以『拿出證據

---

<sup>18</sup>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冊7（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317。此處參考了孟彥弘：〈胡適的政治立場——以其對國共兩黨的態度為中心〉，見香港珠海學院、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胡適研究會、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共同主辦：「胡適與中國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年12月16日-19日），《「胡適與中國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未刊本），頁385-396。



來』的氣慨凌人……卻不知道『拿出證據來』本身還是一個成見，『拿出證據來』本身卻拿不出證據」。<sup>19</sup> 正因為胡適及一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公開形象是以實驗主義反對「主義」，主張學術獨立，主張要走英美大力發展學術的路，而不是俄國的革命道路，所以遭到「主義者」的猛烈攻擊。

## 二、

在「主義化」的時代，學生社團最為風起雲湧，但是在無數史料中，我也找到一些對主義持保留或反對態度的，他們大多受了五四思想的影響。他們常常只有隻言片語，而且論點各殊，大致可以分成四類。第一類是資格論，如《浙江青年團月刊》，這似乎是一個無政府主義刊物，它主張要人人皆聖賢才能行主義。<sup>20</sup> 如《新共和》便引用張東蓀所言，主張：「人性未經改造以前，決不可輕行無政府共產主義。」<sup>21</sup> 論者中還有一種樣態，認為要先有一種職業的人才配實行主義。如1922年8月，有一位筆名「勉人」的在《學燈》上發表〈為談主義者進一解〉一文中，痛斥「偽學者」高談主義，他問：「『主義

<sup>19</sup> 朱言鈞：〈實驗主義〉，《民鐸雜誌》第9卷第4期，1928年，頁1、7。但賀麟的《當代中國哲學》批評說：「由於實驗主義重行輕知，重近功忽遠效，重功利輕道義，故其在理論上乏堅實的系統，在主義上無確定的信仰。在他們的目光中，一切都是假設，隨時可以改變。所以其理論是消極的破壞意義居多，積極建設的意義很少。……所以實驗主義者，沒有堅定的信仰，沒有革命的方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談主義，多談問題』，正是實驗主義者最直率的自白，這種零碎片斷的作風，其結局在哲學上不能成立偉大的系統，在行為上無團體的組織，無堅定不移的理想和信仰。故不論在政治方面、理論方面，都不能滿足青年精神生活的要求。」賀麟：《當代中國哲學》（南京：勝利出版公司，1945年），頁52。

<sup>20</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2集上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頁428-430。

<sup>21</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2集下冊，頁518。

國』人人可談嗎？」認為談主義的人須有一種正當的職業才行，「你們沒有職業，你們實在不配談主義」、「年富力強的青年，他們正當為社會服務，這是他們為社會服務的大好時機。他們偏偏不然，高談主義，旁的什麼事都不願做」。又說，談主義的人須對主義有研究，不應該「跪在主義面前」，硬說馬克思主義一無可訾，俄國實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也應該實行。<sup>22</sup>

第二類是五四的正脈，主張道德、教育、文學優先論，如《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不鼓吹一種主義，不主張一種學說，創造一個新道德、新教育、新經濟、新文學之愉快美滿的社會。」<sup>23</sup> 第三類是受問題與主義論戰的影響，主張「問題」優先論者，如《蕪湖》〈宣言〉中說，蕪湖學社反對空談主義，認為必需藉著一個問題來應用我們一種主義研究的心得。<sup>24</sup> 毛澤東（1893-1976）在「問題與主義論戰」之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也是持「問題」優先的觀點。<sup>25</sup> 第四類是懷疑主義者，如《蕪湖學生會旬刊》說：「懷疑一切，懷疑舊的，也懷疑德謨克拉西主義」，痛斥時人「並不明了新派是何種主義，就崇拜起新派來」；<sup>26</sup> 或是認為在「主義」之前有更重要的，如良心、懷疑、覺悟，它們都優先於主義論者。

認為談主義，實行主義必須有前提、有條件的學者，我認為以張東蓀最有代表性。先是羅素（1872-1970）說他不給中國推薦社會主義，在羅素的觀察基礎上，張東蓀於1920年11月發表的〈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中，認為當時中國人尚未得到「人的生活」，所以還不配談任何主義。張東蓀先引了舒新城（1893-1960）的

<sup>22</sup> 勉人：〈為談主義者進一解〉，《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8月16日。

<sup>23</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2集上冊，頁241。

<sup>24</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2集下冊，頁480。

<sup>25</sup> 見毛澤東：〈問題研究會章程〉，《北京大學日刊》第467期，1919年，頁2-4。

<sup>26</sup> 《蕪湖學生會旬刊》條，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2集，上冊，頁477。

一段話說：「中國現在沒有談論什麼主義的資格，沒有採取什麼主義的餘地，因為中國處處都不夠。」然後是他自己的話：「我們苟不把大多數人使他得著人的生活，而空談主義必定是無結果。或者我們也可以說有一個主義，就是使中國人從來未過過人的生活，都得著人的生活，而不是歐美現成的甚麼社會主義，甚個國富主義，甚麼無政府主義，甚麼多數派主義等等。」<sup>27</sup> 他一方面認為「主義」是一個高遠的目標，不是隨隨便便可以談的，要一般人皆可以過「人的生活」時才能談，同時也把中國當時努力的目標放在另一方面，即開發實業增加中國的富力，使大部分人過著「人的生活」。

這裡面有一個緊張，一邊是「主義國」是人人能進的嗎？一邊認為若不進「主義國」，則「人的生活」要如何達到。陳望道（1891-1977）反駁張東蓀說：「你難道以為處處都成通商口岸和都會，才可得著人的生活，才有談主義的資格嗎？」邵力子（1882-1967）也說：「而要使中國人得著『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種主義不可。」<sup>28</sup> 主義者認為要實行主義才能有產業、經濟、有「人的生活」，反主義者認為要先有現代的產業、經濟的生活，才能談主義。這種悖論在當時所在多有，如蔣介石（1887-1975），批評他的人認為不夠自由才形成敗局，而蔣介石則認為是太過自由才形成敗局。

大體而言，從上述的言論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幾種論調：一是「主義資格論」者，這一派人認為「主義」是一種向上才能達到的境界，不是人人可及的，而且它多少認為要透過修善的努力才能企及「主義」的境界。譬如說要如「聖賢」般為團體獻身才能談主義，或是人先有一種職業之後才配談主義。第二種是認為先成「黨」才能談主義，在此之前不配談主義，或是如舒新城、張東蓀所說的，先過一

---

<sup>27</sup> 陳獨秀：〈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原載《時事新報》），《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頁1。

<sup>28</sup> 陳獨秀：〈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頁4、7。

種「人的生活」才能談主義。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後五四時代有些反對「主義化」的零星言論中都隱含一種不滿，即「主義化」迫使人們只能在「左」「右」之間選擇，並認為「調和」、「折衷」是最大的罪過。故有一種反主義的論點是主張「調和」，他們反對一個人非得選擇向「左」或向「右」不可，認為「調和」、「折衷」的態度才是人的正常生活。此時的「調和」不一定是「新」、「舊」之間的調和，而是「左」、「右」的調和，陶孟和（1887-1960）、章士釗等人便是宣揚這個主張。章士釗的「虛主義」或「消主義」，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說的，因而引起「主義者」極大的反感與憤怒，用朱執信（1885-1920）的話說，章士釗失去了「學者的良心」。<sup>29</sup>曾在英國受過學術訓練的社會學者陶孟和在北伐前後「主義」橫掃一切時，發表了〈主義與他的限制〉一文，他說：「在這個人人都是用主義相標榜，用主義相攻擊的時候，我們有時真覺得有廢止一切主義的必要。」<sup>30</sup>

這些爭論在北伐之後，因為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全國的「大經大法」，引起了對「主義」式政治的反思與批判，其中可以民初青年黨領導人、國家主義者常燕生（1898-1947）為代表。常氏在1927年所寫的《三民主義批判》，是我目前為止所見到過對三民主義最成系統的批判。這本小書原是天壤間的罕本，所幸經過學者的努力，我們終於可以讀到。<sup>31</sup>這本小書左打共產黨主義，右打三民主義，並處處指出孫中山迷信俄國，套用俄國主義的情形。書中對民族、民權、民生主義都有長篇大論的批判，譬如他說：「把三個主義硬拉在一起，讓

---

<sup>29</sup> 朱執信在1920年的文章，收於《朱執信文錄》。我用的是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卷，頁517-524，尤其是頁522。

<sup>30</sup> 孟和：〈主義與他的制限〉，《現代評論》第5卷第109期，1927年1月，頁85。

<sup>31</sup> 經陳正茂多方查找，將它整理編入常燕生原著，陳正茂編著：《被遺忘的學者：常燕生教育政治論文集》（臺北：獨立作家，2016年）後，始得面世。

人好像覺得可以選擇執行其中一個主義即可解決一切的錯覺。」又如說民族主義六講中，大錯之處有三點：民權主義東拼西湊，不了解民權；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夾纏不清等，不一而足。但是在最後他還是向孫中山致敬。<sup>32</sup>

常氏除了在學理上對民族、民權、民生有所批評外，他的評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三民主義不是一種政治理論，而是一種「信仰」。他說：「自國民黨勢力擴張以來，三民主義已完全變為宗教信仰，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之下，對於三民主義是只許頂禮膜拜」、「三民主義即已脫離了理論的根據，而變成神秘的信仰了」。<sup>33</sup>而我認為常燕生對「主義」作為一種新型政治「信仰」的反思，與他對三民主義內容本身的批判是同等重要的。

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常燕生在《三民主義批判》中還提到，即在這麼緊的「主義」政治之下，調子唱得很高，要求這樣、要求那樣，但落實到實際狀況，卻是在彌天大網下形成了奇怪的「無治狀態」。他說當時在「主義」滔天的局面下，流行的其實是另一套：「至於今日中國所流行的無治主義，世界主義，人道主義，和平主義，等等各色，乃是從老、莊以來的傳統東方思想，是懶惰的，落後的，反動的思想。這傳統的思想，在中國人的腦筋中，已經根深蒂固，發之於文藝，發之於思想，發之於談話，結果徒造成兩晉清談之禍。」<sup>34</sup>究竟該如何了解這一種「無治狀態」的形成，值得更深入研究。不過，一方面把政治主義化、信仰化，正像是把一切關注集中到一個看似很高的高調，但同時卻把日常的現實政治抽空，成為空虛狀態。常燕生藉此反思「主義式政治」，不但不是「一抓就靈」的萬靈丹，而且是對正常政治的嚴重干擾。

<sup>32</sup> 常燕生：《三民主義批判》，收於常燕生原著，陳正茂編著：《被遺忘的學者：常燕生教育政治論文集》。

<sup>33</sup> 常燕生：《三民主義批判》，頁241。

<sup>34</sup> 常燕生：《三民主義批判》，頁295。

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6月，當吳經熊（1899-1986）以個人名義發表了「憲法草案」，而其中第一條為「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引爆了關於「三民主義共和國」的爭論。這個論戰斷斷續續了13年（1933-1946）之久，前後分成兩波，一波是抗戰前，一波在抗戰後，雙方展開激烈的文章論戰。<sup>35</sup> 參與這次論戰的兩方分別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理論工作者，以及反對方——主要是一些憲政政治學者，他們反對將三民主義當成唯一的「主義」明定在憲法條文裡。

吳經熊的草案發表之後，《大公報》、《益世報》都發表社評加以強烈反對。《大公報》短評說，把三民主義分配到全部憲法之內各占一篇，看來是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憲法，而不是中華民國的憲法，「因為政黨和主義是一時的，國家和憲法是永久的」。《益世報》的社評說：「今後政治集團違背三民主義即不許組織，今後政治信仰違背三民主義即缺乏自由。」國民黨的理論工作者胡夢華，首先以〈三民主義共和國〉一文，引用兩段社評為破題，一一加以反擊。<sup>36</sup>

胡夢華（1903-1983）曾在安徽省立一師擔任校長，當時正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訓練處長。他批評反對者犯了三種錯誤：「一，未能認清憲法為革命和歷史的產物；二，未能貫通三民主義與中華民國建國的聯鎖關係；三、未能認識國民黨之真精神。」他說：「憲法只有革命者的利益。」所以英國的〈權利要求〉、法國的〈人權宣言〉都反映了革命者的要求，而俄國革命後的憲法「只有工農兵蘇維埃的利益，便抹殺了資產階及其他一切人士的利益」。<sup>37</sup> 此文一出之後，

<sup>35</sup> 依據「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以「三民主義共和國」檢索而得的標題數字，就高達27篇之多，可見一斑。見「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1-11輯」，網址：<http://www.cnbksy.cn>，檢索日期：2018年3月1日。

<sup>36</sup> 胡夢華：〈三民主義共和國〉，《人民評論旬刊》第1卷第9期，1933年，頁6。

<sup>37</sup> 胡夢華：〈三民主義共和國〉，頁7。

支持「主義」作為憲法第一條者的意見，大多與胡夢華如出一轍，形成了一定的格套。像張絢中（1909-1941）的文章便強調說，以「主義」為憲法之第一章是「一勞永逸的革命思想」。<sup>38</sup> 陳之邁（1908-1978）則認為一個國家要有「立國精神」，而「三民主義共和國」中「共和國」是表明「團體」，三民主義是表示「立國精神」，而且強調「我們的政府是一個萬能的政府，是有無限威力的政府」，並進一步強調傳統無政府主義式的自由主義，是完成不了三民主義的使命的。<sup>39</sup>

上述諸家中最值得注意的共同點是以「歷史事實」為基礎的「主義國家論」，認為辛亥革命成功以及抗戰勝利都是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成功的，這兩個歷史事件證明「主義」、「國家」為一體的必然性。如張彝鼎（1902-1992）〈三民主義共和國之解釋問題〉，認為歷經與日本的七年血戰後，人們應清楚明白中華民國「國魂」之所在，「矢誓服膺三民主義，成為中華民國立國之主義，而後意見乃歸於齊一」，認為反對的是「忽略歷史事實」。<sup>40</sup> 支持者或賦予另一種解釋，如1946年孟雲橋（1904-1988）〈「三民主義共和國」一條應否刪除？〉一文中說，三民主義不只是中國全體國民乃至世界人類，所應共同相信之真理，因為民生主義就是現在流行的社會主義，民權主義就是現代流行的所謂民主政治，民族主義的最後目的即是世界大同。<sup>41</sup>

「團結」與「效率」這兩件國家最需要的東西，究竟如何獲得？「三民主義共和國」的支持者認為只有在唯一「主義」之下才能得到。反對者如余家菊（1898-1976）則不這樣認為，他在〈憲政與三民主義共和國〉中說：「弭爭之法何在？即憲政軌範是也」、「人心平則民氣和，而團結有可能，效率有可高之望。信仰之統一，未必能奏此功

<sup>38</sup> 張絢中：〈論一勞永逸的革命思想〉，《血路》第50期，1939年，頁804-807。

<sup>39</sup> 陳之邁：〈三民主義共和國〉，《新認識》第5卷第3期，1942年，頁3-4。

<sup>40</sup> 張彝鼎：〈三民主義共和國之解釋問題〉，《三民主義半月刊》第4卷第10期，1944年，頁2-3。

<sup>41</sup> 孟雲橋：〈「三民主義共和國」一條應否刪除？〉，《新批評半月刊》第12期，1946年，頁158。



也」。<sup>42</sup> 留學日本的憲法學者林紀東（1915-1990）則在1933年發表了一篇評論，說：「大凡一種主義的實用性都附有嚴切的時間和空間的條件。在環境需要的時候，他固然應運而生，但一旦時過境遷，就有增綴減縮或根本廢棄的必要了」、「至于憲法，雖則未必是什麼『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東西，然而他終竟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其受制於時間性的程度，遠視一種主義為不同」、「既然實行多黨政治，則一黨有一黨的主義，一黨有一黨的政策，勢不能以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強使同之。在憲法裡規定三民主義，豈不仍然是一黨專政？憲政於何有？」<sup>43</sup>

在這一波「三民主義共和國」的論戰中，民社黨張君勱（1887-1969）在《立國之道》（1938）中攻擊孫中山的主義，但他並不直接提「三民主義」，而是說民族、民權、民生「三原則」。<sup>44</sup> 同樣是民社黨的左舜生（1893-1969），在〈哥德論革命〉中說：「但不幸中國在最近的五十年，革命乃成了無上的美名。好像凡革命都是對的，凡不革命或反革命都是該死的。自革命職業化，而天下皆亂人，自功利革命化，而天下皆強盜。」<sup>45</sup>

### 三、

因「主義」在當時已成了絕對唯一的真理，故消極放棄或積極反對都是表達一種態度，如傅斯年留歐回來後不談主義，而談政治、法律、國民訓練，或是像朱光潛熱衷於擺脫「主義」，談「人生觀」與「修養」的問題。如朱光潛《談修養》中說：「我信賴我的四十餘年的

---

<sup>42</sup> 余家菊：〈憲政與三民主義共和國〉，《民憲（重慶）》第1卷第2期，1944年，頁18。

<sup>43</sup> 林紀東：〈關於「三民主義共和國」〉，《獨立評論》第47號，1933年，頁19-20。

<sup>44</sup> 張君勱：《立國之道》（臺北：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1969年），頁1。

<sup>45</sup> 左舜生：《萬竹樓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112。



積蓄，不向主義鑄造者舉債。」<sup>46</sup> 朱光潛有這樣的觀點並不會令人驚訝，他在書中強調的是個人的覺悟與努力。看他書中各章的題目，即可知道他走的是五四以來個人的、倫理的、藝術的道路，而不是主義的、革命的道路，故他攻擊後者說：「他們憑自己的單純心理，建造一種難於立而實現的社會理想，而事實卻往往與這理想背馳之。」<sup>47</sup>

「人生觀」與「修養」是「主義」與「反主義」兩個思想陣營決戰的戰場之一，而朱光潛《談修養》一書的內容，與當時各種右派或左派談人生觀的書是相當不同的。所以他說不向「左」或「右」的主義「舉債」。朱氏的〈中國思想的危機〉，則批評當時不允許不在「左」或「右」之間選擇一種主義的「政治思想的倫理化」的危機。他說，「左」即推翻中國政治經濟現狀，而「右」則包含了一切：主張維持現狀者；或不滿意現狀，而不同情蘇俄與共產主義者；或是同情之，覺得現時中國尚談不到這一層者；甚至於不關心政治而不表示任何態度者。但他對兩者概不贊同。朱光潛認為，政治思想成爲劃分敵友之界線，「誤認信仰爲思想，以及誤從旁人的意見爲自己思想的惡風氣」，「以口號標語作防禦戰，已成爲各黨派的共同戰術」，使得一個人非左傾或右傾不可。青年們是先確定了「信仰」再去「思想」——「他們腦裡先充滿著一些固定觀念，這些固定觀念先入爲主，決定了他們的一切思路，一切應付事務的態度」。<sup>48</sup> 而他的文章則想避過「信仰」先於「思想」的套路。

至於傳統主義者則是透過另一種方式，對「主義式政治」或「主義式生活」進行答辯，以下便以梁漱溟爲例，說明他們不同的處方。梁漱溟認爲現代社會不可能不求同，不可能不求團結。他說：「在中

---

<sup>46</sup> 朱光潛：《談修養》，收於朱光潛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朱光潛全集》冊4（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頁5。

<sup>47</sup> 朱光潛：《談修養》，收於朱光潛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朱光潛全集》，頁24。

<sup>48</sup> 朱光潛：〈中國思想的危機〉，收於朱光潛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朱光潛全集》冊8，頁514-518。

國以前的士人，沒有團體，只有朋友，其原因甚多，但根本還在一點：即中國士人理性開發，喜出己見，從吾所好；而不信仰一個對象，與宗教正相反」、「拿一個主義主張結團體，是強人從我；在見解上求同，是忽略人格，這個在中國大概是不可能。中國士人要想結合團體，大概須掉轉過來：在見解主張上可以從容商量，而在另外一點——人格志趣上求同。必志趣相投才有結合的可能。志趣相投，即志同道合，即同有志於人生向上的人。」<sup>49</sup> 梁漱溟的意思，是用傳統的辦法也能達到「主義」所欲達成的目標，而且更合乎人性。

梁漱溟認為傳統中國是一個職業分途，沒有階級分野的社會，故他提出的解答帶有宋明以來鄉約色彩的鄉村建設，然後「以農業來引導工業的民族復興」。在這樣的社會不需要「主義式的政治」、「主義式的生活」，也可以達到重建社會的目標，只需要有大方向，順著社會發展的要求所產生出的數條「方針路線」即可。<sup>50</sup> 章士釗則提出「農國」的主張，其實也是在回答如果不要「主義」，要如何度過難關的問題。

但是比較有傳統農業社會式的道路，也不一定是傳統主義者的專利。章士釗1926年提出「農國」的思想，在當時的中國這是非常獨特的想法，他主張以「農國」為根本，再適度引進近代工業的好處。章士釗的〈農國辨〉中對中國傳統的「農國」與西方現代的「工國」做了不少深入而有意思的比較，他認為西方近代「工國」產生了無數的問題，譬如工國「因之資產集中，貧富懸殊，國內有勞資兩級相對如寇讎」、「明言財利，內賄外政，比周為黨」、「同業之相兼亦急，而謀壟斷天下」等，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共產黨的第三國際有「逃工歸農」之意，與「農國」之本義相默契。<sup>51</sup> 在「農國」之中不會

<sup>49</sup> 梁漱溟：〈談組織團體原則〉，收於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冊2（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12。

<sup>50</sup>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sup>51</sup> 孤桐：〈農國辨〉，《甲寅》（北京）第1卷第26期，1926年，頁9、10、11、12。

發展到貧富「相對如寇讎者」的地步，也就不需要第三國際、共產主義、階級鬥爭。章士釗的〈農國辨〉寫於1926年，梁漱溟的〈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於1927年提出，恐怕都與「主義」的風潮不無關係。<sup>52</sup>

在1950年代的臺灣，國民政府整軍經武，準備反攻大陸，並且將「主義」與「領袖」提到極高的地位，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也以宣傳運動的方式大加鼓吹。胡適就在1958年從美國回臺灣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蔣介石這兩個極不相容的人，在睽違多年之後，又被命運擺在一起。

1958年胡適在中央廣播電台對大陸同胞的廣播中，強調共產黨為什麼要清算他，因為他「一貫認為一切的主義和思想，都不是絕對的真理」。<sup>53</sup> 同年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演講中，他表示支持蔣介石說「三民主義是科學的」。他說：「這句話是有一個解釋，即三民主義因為不是武斷的，不是獨裁的，不是教條主義的，是兼容並蓄的。」又說：「我們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這三方面都沒有獨斷一尊的意思。」<sup>54</sup> 胡適支持蔣介石的同時，其實是為「主義」做一個新解釋，希望把它從定於一尊的「信仰」，轉成是一種「政治的學理」。

胡適在1959年〈杜威在中國〉的講詞中說：「在合理的思想過程中，所有的理論，所有的學說，統統不能看作是絕對的真理，只能看作是有待考驗的假設，有待於在實用中加以考驗的假定，只能看作是幫助人類知識的工具和材料，不能看作是不成問題，不容考慮的教

---

<sup>52</sup> 梁漱溟：〈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收於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冊4，頁825-832。此外，以傅斯年為例，他則提出所謂的「國民訓練」來取代「主義」。見傅斯年：〈政府與提倡道德〉，《大公報》（天津）第2版，1934年11月25日。

<sup>53</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7，頁2683。

<sup>54</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7，頁2787-2788。

條，因而窒息了人類的思想。」<sup>55</sup> 上面所引這一些說話，都同時既針對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可以說明他在「問題與主義論戰」中對「主義」所持的批判態度前後一致。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主義」是一種「信仰」。這種「信仰」不但支配政治行動，它還要決定人們的生活方式，所以討論「反主義」時不能不略略提及這個問題。

對於受傳統心態影響的人而言，「主義」式政治很新、很陌生。它要人們的日常生活直接或間接地都與政治有關，不停地透過口號、標語、動員，胡適在1928年時即已不滿地表示這是一種「新名教」。<sup>56</sup> 而且「主義」往往還要決定，是要過個人優先的生活還是團體優先的生活，是個人優先的生活還是主義優先的生活。不同的主義還以不同方式來指導、決定人們生活的方式，甚至要全面地接管人們的私人領域。<sup>57</sup> 1930年代起，許多進步青年是主動希望將「主義」與「生活」結合在一起，並且以最大的熱情來檢查自己的日常生活及私人領域。

茅盾（1896-1981）的女兒沈霞（1921-1945）的日記中便充斥著「主義」與「生活」結合在一起的寫照，這裡我就臚列幾條例子：「今後，不是說什麼朋友或愛人，主要的是在感情的內容上加以革新，這樣才會有前途」、「我要用學習來統制自己，排除一切不必要的思想活動」、「對一個同志的愛，主要是對整個階級的愛，如果是與階級有衝突的東西，那就需要絕對的無情」、「向組織講，組織上將說什麼話是我行動的指南」、「記住在黨的原則下，私人感情等於灰塵」、「現在除了黨的話，任何人的話我都不會懂得，不會了解」、「我下決心在這三

<sup>55</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8，頁2986。

<sup>56</sup> 胡適：〈名教〉，收於胡適著，季羨林編：《胡適全集》，頁61-72。

<sup>57</sup> 詳細論述請參見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主義」與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等文章，收入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2017年）。

個月冬季學習中，把自己審查得清清楚楚，然後，將來能有一天，帶著嶄新的姿態去見他們」、「爲什麼我還要愛他這個從思想上、政治上都不健全的人」。<sup>58</sup>

正因爲「主義」想要決定人們的生活方式，所以有一種「反主義」者，是藉著提倡一種刻意非政治的生活方式，刻意把頭別過去來投射出他們反主義的意思。譬如林語堂一方面說：「今日談國是最令人作嘔者，乃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的必要」、「今日之病在人非在主義，在民族非在機關」；<sup>59</sup>另一方面他的文學主張，包括提供幽默、性靈、小品等，顯然都是想解消正經八百的「主義」式生活，但以不在正反相對的範疇之外的方式來解消之。郁達夫（1896-1945）1935年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所寫的導言中即指出林語堂是「隱士和叛逆者」，而且認爲他提倡幽默與性靈是對當時政府及社會主義文學之消極批判。<sup>60</sup>我完全同意這個觀察，但是林語堂針對的是「左」、「右」兩種「主義」，甚至是所有政治上的「正經八百」，而不只是社會主義。

## 結論

歸納上述，在主義時代來臨之時，人們認爲五四以來的民主、自由主義本身的論述或價值，會對單一、強制的「主義」觀點，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對抗作用，故大部分的人對「主義化」的浪潮選擇沉

---

<sup>58</sup> 沈霞、鍾桂松整理：《延安四年（1942-1945）》（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頁92、105、110、118、124、137、168。

<sup>59</sup> 林語堂：〈給玄同先生的信〉，收入劉志學主編：《林語堂散文集》冊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16-117。

<sup>60</sup> 郁達夫：〈導言〉，見郁達夫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七集·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頁10、16。相關說法，可參考 Chih-p'ing Chou (周質平), "On Lin Yutang: Between Revolution and Nostalgia," in *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 Suoqiao Qi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16), 19-37。

默、安靜或噤聲、只有零星的人表示保留意見或公開地加以反對，但是他們提出的主張往往十分零碎。當然，這些零碎的說法可能是重要的，但是在客觀影響上，當時不足以形成一個對抗「主義」狂潮的思想資源，更遑論結集成為反主義的力量。

反主義者們主要是質疑政治是不是一種「信仰」？政治世界有沒有永恆不變的真理？政治領袖或一群黨員是不是足以代表主義這一套概括一切的真理主張？但因當時「主義化」的力量太大，故對「主義」持保留意見者亦每每依違兩可，不敢直視。他們對於當時青年所關心的，如何統一心志與力量，如何形成有力的團體等問題，大多並未明確地提出另一套思想，或另一條有用的思路來對抗。同時，在實質上也未能連結成一種力量，甚至不屑連結成一種力量。我覺得這也顯示了「主義」的優勢，和反主義者所面對的兩難，因為在孫中山的論述中，主義為「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目的在於如何以思想上的控制力統合出集體的力量，這是主義吸引力或價值所在，卻也是反主義者所反對的。於是反主義者不屑連結成力量，符合他們對主義的看法，卻也無法擁有和主義抗衡的實力基礎，後來「問題派」的敗退也可以歸導於此。值得注意的是，在1930年代有一種言論，認為「主義」不一定是求團結、求一致、求效率的唯一道路。如前述，梁漱溟便不認為應該是由上而下的主義，而是個個人自覺所結合而成的志趣相投的團體。

此外，新文化運動對反主義的影響，可歸納為兩種不同的思想資源，一是新文化運動的正統派，他們認為文學、哲學、道德、教育等才是優先的，主義的、一抓就靈的、全盤根本解決的，不是正路。「問題與主義」論戰中，「問題派」即為代表，我們知道許多原先主張「問題」的青年後來轉向服膺主義，但從五四之後零星的反主義言論中，仍可以識認出一些受「問題」主張影響而持續對主義保持反省的人。另一種「反主義」的路數則是新文化運動中強大的懷疑精神，「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有些則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不過，無政府

主義和主義時代的關係，十分複雜，非本文所能完全回答，在擁護主義和反對主義的陣營中，皆能見到無政府的影響。

北伐之後，反主義者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本文中所提到的「三民主義共和國」的爭論即與此有關。在「三民主義共和國」的爭論中，關鍵的主題是「黨可以由主義決定，但國家不可以」。常燕生的《三民主義批判》也是這一方面的代表，不過常燕生的書後來幾乎成爲天壤間的孤本，所以實際影響很有限。

在「主義」之下反「主義」，在當時最常見的是用主義式的思維或語言反主義，變成即使反對主義，也必須要加上「主義」的名號，如自由主義。要不就在論述上走上另一極端，被主義規範、擠壓下的反主義，爲了避免被人視爲另一種主義，刻意走向零碎之解決，譬如「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之「問題」，本來不一定是這樣談的。

最後我想提到一點，我們通常都注意到主義「定於一尊」的權威，不但要人做什麼，而且同時也不要讓人們做什麼；但是它有一個副作用是「不解決」，不單是不想或不能解決，同時也不准別人解決實質生活中的問題。不主義的，或是沒有掌握權力，不具備主義詮釋權的人，常常不被鼓勵去做什麼。尤其是紙上談兵式的「主義化」時代，最容易形成這樣的弔詭之局。常燕生批判的三民主義所形成的「無治狀態」，即是最好的例子。依樣畫葫蘆式的主義，只是在沙灘上無限廣闊地畫下一幅政治藍圖，既沒有真正影響沙面之下的土壤，但是海水一來便沖刷殆盡。不停地規劃、動員、呼口號，但實際上是什麼都沒做，也不讓人家做，對主義的歌頌，從信仰的手段變成了信仰的目的，造成實質生活中的「政治空洞化」的主義政治，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反省的。

我個人認爲今天重訪「反主義」者的思想言論，仍有一些現實的意義。「主義」式政治在今日仍然是一種誘惑。那種「包醫百病」、一抓就靈，在總發電機下全力運行的政治想像，往往是一種極大的誘惑。尤其是當人們藉對話以形成共識的耐心已經磨光的時候，在許多



---

人腦海深處，很自然地想回到「主義」的方式來思考如何應付「後主義時代」的政治、思想、存在的危機。政治人物應該有一定的信念，但是「主義」式政治把特定政治信念變成眾人的「信仰」，其實帶有一定的危險性，值得關心民國以來的政治歷史者注意。



## 徵引書目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2集上、下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
- 毛澤東：〈問題研究會章程〉，《北京大學日刊》第467期，1919年。
-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2017年。
- 左舜生：《萬竹樓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 朱光潛：〈中國思想的危機〉，收於朱光潛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朱光潛全集》冊8，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 朱光潛：《談修養》，收於朱光潛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朱光潛全集》冊4，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 朱言鈞：〈實驗主義〉，《民鐸雜誌》第9卷第4期，1928年。
- 余家菊：〈憲政與三民主義共和國〉，《民憲（重慶）》第1卷第2期，1944年。
- 求實（李偉森）：〈評胡適之的「新花樣」（續）〉，《中國青年》第99期，1925年9月。
- 沈霞、鍾桂松整理：《延安四年（1942-1945）》，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 周策縱：〈附錄：論胡適的詩——論詩小札之一〉，收於唐德剛：《胡適雜憶》，臺北：遠流，2011年。
- 孟和：〈主義與他的制限〉，《現代評論》第5卷第109期，1927年1月。
- 孟雲橋：〈「三民主義共和國」一條應否刪除？〉，《新批評半月刊》第12期，1946年。
- 林紀東：〈關於「三民主義共和國」〉，《獨立評論》第47號，1933年。
- 林語堂：〈給玄同先生的信〉，收於劉志學主編：《林語堂散文集》

- 冊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勉 人：〈爲談主義者進一解〉，《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8月16日。
-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1、冊2、冊7、冊8，臺北：聯經，1984年。
- 胡夢華：〈三民主義共和國〉，《人民評論旬刊》第1卷第9期，1933年。
- 胡 適：〈名教〉，收於胡適著，季羨林編：《胡適全集》冊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 胡 適：〈我的歧路〉，收於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冊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胡 適：〈致張慰慈〉，收於胡適著，季羨林編：《胡適全集》冊24，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 胡 適：《問題與主義》，臺北：遠流，1986年。
- 胡 適：《嘗試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
- 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編》冊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 胡樸安著，雪克編校：《胡樸安學術論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 郁達夫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七集·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
- 孤 桐：〈農國辨〉，《甲寅》（北京）第1卷第26期，1926年。
- 徐志摩：〈歐游漫錄〉，收於徐志摩著，蔣復璁、梁實秋編：《徐志摩全集》，新北：傳記文學，1969年。
-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冊7，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
- 常燕生：《三民主義批判》，收於常燕生原著，陳正茂編著：《被遺忘的學者：常燕生教育政治論文集》，臺北：獨立作家，2016年。
- 張君勱：《立國之道》，臺北：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1969年。
- 張絢中：〈論一勞永逸的革命思想〉，《血路》第50期，1939年。
- 張彝鼎：〈三民主義共和國之解釋問題〉，《三民主義半月刊》第4卷

第10期，1944年。

梁漱溟：〈談組織團體原則〉，收於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冊2，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

梁漱溟：〈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收於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冊4，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陳之邁：〈三民主義共和國〉，《新認識》第5卷第3期，1942年。

陳獨秀：〈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原載《時事新報》），《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

陳獨秀：〈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

傅斯年：〈政府與提倡道德〉，《大公報》（天津）第2版，1934年11月25日。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南京：勝利出版公司，1945年。

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1-11輯，網址：<http://www.cnbkxy.cn>，檢索日期：2018年3月1日。

Chou, Chih-p'ing. "On Lin Yutang: Between Revolution and Nostalgia." In *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Suoqiao Qian, 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16.

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十四期（2018年6月）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East Asia Vol. 14

---

發行者：國立政治大學《東亞觀念史集刊》編輯委員會

編輯者：國立政治大學《東亞觀念史集刊》編輯委員會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觀念史集刊》編輯部

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

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

榮譽總編輯：金觀濤

主 編：鄭文惠

出版者：國立政治大學《東亞觀念史集刊》編輯委員會

地 址：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No.64, Sec. 2, C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網 址：<http://jhiea.nccu.edu.tw/>

電 話：886-2-29393091#80636、80637

E-mail：[J.HIEA.100@gmail.com](mailto:J.HIEA.100@gmail.com)

初 版：2018年6月

二 版：2020年11月

排 版：弘道實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德惠街173號5樓

總經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

<https://www.showwe.com.tw/>

定 價：450元

ISSN：2303-9205

DOI：10.29425/JHIEA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